

文庫博物館專集（十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增刊 第一〇九期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illegible]

- 1.【微观历史】“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二之一） 仲维光
- 2.【五洲震荡】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 1966—1979 高达乐

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有的（如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一、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血统论”在其产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红卫兵是否是维护一小部份人极权的产物？

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党卫军——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从清华附中红卫兵产生扩展到红八月前后的红卫兵及东、西城纠察队，从红八月到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历史过程。

三、造反派（红卫兵）和红卫兵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如何看待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用封建专制一词来描述是不确切的）的政治和文化？红卫兵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一、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华附中初中。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阶级路线，大学和大学中的专业录取都有很严格的出身标准。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老师和校领导也已经“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胆大妄为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从表面上消失。当然，实际上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话怎么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们学校自编的语文课本上就开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从六三年起，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做无产阶级接班人、反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等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升入高中前学校又开始了对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我们那时的政治课，及学校和班里的壁报都是这一内容。六五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仿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郑义（笔名，原名郑光召）当时是这一剧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从六二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谈论阶级斗争。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继而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全面深挖修正主义根子。阶级斗争及伴随而来的阶级路线使极权在各个领域都向更深层蔓延，直到六六年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

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六四年“教改”出现时就已经感到又要大难临头。这一年二月十三日，刚好是旧历春节，毛泽东在听取邓小平、陆定一、林枫、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的情况介绍时明确地指出：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历来状元没有出色的……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同年七月五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该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的文件，从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到六五年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实和其它各国的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共性，很多现象也类似。那时，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同时开始的社教、四清运动，和伴随着阶级斗争而来的阶级路线，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北京的中学、大学。从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招生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很多人，从出身上就被决定了绝对进不了大学门。一般出身的人，则被大学的重重密级规定所限制，很多专业根本不会取他们。他们只能报考师范或那些古老的、与国家发展关系重大的前沿理论技术无关的专业。我所在的清华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称为天才少年的学生，他刚刚十六岁，功课极好，只因为父亲在台湾，而被拒之在大学门外。这一下子几乎使他神经崩溃，他哭着喊着要到台湾找父亲。他成了学校教育我们的白专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学，章坚，学习成绩优秀，只因为出身问题，就没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学。这一打击改变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六十年代，出身稍有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没有压力地生活。

伴随着大形势传来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和给毛远新的信。革命接班人问题，干部子弟的理想抱负问题，教育革命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通天的干部子弟从六三年开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中躁动，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聪明一点的北京市的某些中学大学的领导人为了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自保，已经学会了看着某些干部子弟的颜色行事。六三年开始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都开始了四清。这些学校的领导除了在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干部教师队伍的阶级路线上存在问题外，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条罪状。因此，除了在这些学校的领导层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激烈的清理、撤换领导班子外，在学生中也展开了贯彻阶级路线、清理白专学生的运动。很多班级的班干部即刻进行了撤换。事实上，在那时的班干部中已经基本上没有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只有出身一般而仍然不是红五类，或是老实的工农子弟。因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经没有老师敢于用出身不好的学生作班上或学校的领导工作。因为，只此一点就说明这位老师在政治上有问题。但是尽管如此，班干部还是要再清理，要尽可能地都换成干部子弟。

在这场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学生已经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例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级运动员，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他只是由于有体育特长和学习好，清华大学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松动，所以很运气地被清华破例录取，但是，进的是密级最低的土建系。我还认识一位与此有同样遭遇的八中的学生。

北大附中的宫小吉的文章“换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出现的。宫的文章也许讲了一些一般学生的投机取巧的作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形势和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影响下，来对旧教育系统进行清算，是为继续推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是亦步亦趋在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大方向下的。

六三年以后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导思想都是巩固政权，继续五十年代以来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和文化教育的彻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具。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独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要清算。如果说五十年代对道德和知识，对传统和文化是灭顶的毁灭，那么六十年代则是力图要斩尽杀绝，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有上述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学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是教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在蒋南翔的领导下从五十年代起就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红色工程师。五十年代进行了院校调整，利用反右等运动

对教师队伍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则更进一步进行了教材和教学改革。除了更加强调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学上的所谓“少而精”，实际上是使学生向工具性的方向发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内容。那时，我们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参观“反右成果”展览，进行思想教育。有意思的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是原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党总支书记吕森，因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所以下放到附中教书。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老师，课讲得言简意明、清楚之至。整个高中阶段每次课后我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基本上在十五分钟左右，而成绩却几乎没有掉下九十分，完全要归功于这位老师。但是，就是这位“右派”老师，课上言必提主席春节讲话如何如何。可见那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产生的影响。而主席春节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位老师在八十年代复出后，再度出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部主任，据说思想还是很左。

三、六四年到六六年

清华附中之所以没有搞四清是因为它隶属于清华大学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华大学自从蒋南翔掌权以来，一直以推行又红又专、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严格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著称。应该说清华大学已经够“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领导干部都是大学任命的，并且受大学领导，当然和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虽然有大学这面挡风墙，清华附中的校长还是深切地感到从城里中学吹来的这股以干部子弟为前导的四清和阶级斗争之风。从六三年开始，学校已经严格地在学生干部、校干部、学生团员和党员的培养上执行阶级路线。除了升高中时的政治审查外，在高二挑选预科班学生时，为了保证进预科班的学生都能进清华大学，学校对学生家庭进行了外调。据一位老师说，清华附中是当时中学中唯一一所有能力、并且真的做了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外调的学校。

学校领导虽然也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出身地主的校长万邦儒不再做党支部书记，但是，在风声鹤唳的政治形势下仍然非常紧张。

六四年，我进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发生了娄琦、熊刚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刚不满意那天负责卖饭的娄琦所给的饭菜，出言不逊骂了娄琦，因而争吵起来。娄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刚一拳而导致双方扭打。动手打架，在当时的清华附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课间操时学校教导主任对事件的双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表明，此事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在当天的晚自习课上，突然每班的扩音器又响起来，要大家晚自习后不要动，说校长有重要讲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结果是校长以偏袒熊刚的口气对娄琦再次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种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学的哗然。第二天开始在食堂里就出现了不满校领导做法的大字报。并且越来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这件事之所以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因为熊刚的父亲是驻古巴大使。在清华附中也有一大群干部子弟，但是和四中以及师大女附中等校的区别是，很少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薄一波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子弟，在清华附中有的是是一些部级领导人的子弟。这也造成了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特点。因此，熊刚在清华附中也就是较高级别的干部子弟了。六四年，干部子弟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提了出来，清华附中的校长出身地主，其他领导也少有工农出身。当然不愿意由于不能有效地保护干部子弟而犯政治错误，产生政治动荡。

娄熊打架事件，学校领导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大家的不满压制下去，在第一线的娄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压力下最后都做了检查，因为不检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记上一笔，上不了大学，影响终身。经

过了五十年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在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学生虽然年幼、胆大，却也少有人胆大包天，敢自投罗网。

六四年发生的姜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华附中发生的红卫兵事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领导的对抗，而到了六六年却发生了一个反转，这个反转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干部子弟的特权欲。

大约在同时，曾经做过罗瑞卿秘书，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后来的红卫兵小组主要负责人），初中由四中毕业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却通过关系转到了当时北京市中学录取分最高的清华附中。这种转学对平民子弟来说犹如天方夜谭。然而，这位转到清华附中的王铭，由于散漫，在入团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但是，他居然为此向团中央写了一封告状信，说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立即吓得校领导跑来安慰他，并责令班上的团支部发展他入团，入团后则立即就担任了支部组织委员，继而又升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委员。

虽然如此，如上所述，清华附中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由于它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像上面提到的熊刚虽然成绩很好，但是由于是死用功而来，且无任何其它特长，所以仍然没有被分入预科班。而清华附中高中的非预科班学生在学校基本上被视为二等学生。王铭虽然是预科班的学生，但是，他缺乏体育文艺特长，功课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华附中是默默无闻的。至于红卫兵最早的发起者骆小海和邝桃生（干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华则功课平平，体育上是清华附中中最不需要特长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视的航海队成员。说到张承志，则不仅进不了预科班，而且要用课外时间补习数学，且无任何体育文艺特长，是在清华附中感到个性受到很大压抑的一类学生。只有既是干部子弟、功课好，而且体育又极其突出的关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学冠军，数学竞赛二等奖，干部子弟，党员），才是清华附中出尽风头的学生。现在官运亨通的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则因为无干部子弟的跋扈气、听话肯干，风头虽然不如前者但也是清华附中大名鼎鼎的学生。而出身不好的郑光召（郑义）则由于体育文艺突出，竟然在清华附中独领风骚，无出其右者。这是他始终让干部子弟视为肉中刺的原因之一。

干部子弟，却又不是很高级别的干部子弟，在清华附中的平民环境中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束缚。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宫小吉的文章已经在中学中传闻。而这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之，报纸上开始了讨论。这时我同班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在课下也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参与这场讨论。与此同时，受上述影响，一天晚自习后，骆小海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贴了一篇“造反精神万岁”的短文。

骆小海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和宫小吉的文章类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师和旧教育制度的反，无产阶级要占领教育阵地。这篇文章当然在教室后面的壁报上引起了一些讨论。并由此开始在卜大华、邝桃生和骆小海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那时在我们班，预科六五一班，分团委委员班长是王东岩，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杨荣杏（女）是工农子弟，都老实听话，是校领导的“红人”。而前述三人卜、骆、邝，两人出身中层干部，一位是革命军人，从人的本性上是属于不安分，性格活跃的人，应该说比某些校领导的红人有才气，但是，不幸的是他们走入的是卫道之路。

四、红卫兵小组的形成

骆小海的小字报逐渐在班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然，秉校领导意思的人，对这种自作聪明的“乱来”是不能苟同的。校领导也担心这种讨论产生动荡，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宫小吉和骆小海们的不满，当然首先面对的就是学校和老师，以及受学校重用的学生。

然而，在骆小海的小字报后，逐渐由《海瑞罢官》的讨论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墙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伴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骆小海们也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上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从部队内部的宣传中感知到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吹捧，某些人并且已经骄傲地拥有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因此，卜大华、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的中心调子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要占领史学阵地，教育阵地，要占领一切知识阵地，要驱除一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知识和精神领域。比起学校政治课和社会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运动，他们的调子要高得多，他们“高”就“高”在上纲上线上。他们明显的内心冲动就是要看准风向，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刀锋”，争姚文元式的风头！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们的调子已经和学校领导的对“三家村”的批判明显地区分出来，他们认为，学校领导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们认为，“三家村”等黑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场。而“三家村”的黑市场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子弟，这些子弟和“三家村”产生强烈的共鸣，是“三家村”的社会基础。自从六三年批判《北国江南》等电影以来的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即在文化领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而这土壤就是校领导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红五类的“白专”学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华们斗争的矛头已经明显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学生，而校领导之所以使他们不满也不过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其实所谓“重用”不过是没有把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的胸怀世界的抱负。骆小海后来写的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伟大抱负在六五年前后就开始形成了。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缔资产阶级黑市的红卫兵小组已经成了雏型。这对所有不跟着他们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红五类子弟，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由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一切“资产阶级的阵地”，凡不是他们当权的地方当然也就是非无产阶级的。班干部和班里的团干部，是他们目标之一，校领导作为这些人的后台，当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然而，在这种对垒的形势下，校领导的红人——班干部，却是无能的，他们只会跟着“党”走，而不会进行红卫兵小组的那种所谓“独立”的作战。于是，我们这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就逐渐走向了和红卫兵小组对抗的第一线。

大约与此同时，我们班的这个以卜、骆、邝为首的小集团也扩展到其它班级，当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铭等人，这或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高、消息灵通，或是由于和社会联系广，或更主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潮流中的人。王铭小学和初中在育才学校和四中。他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很多是高干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跃的孔丹、秦晓、王尚荣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再后，这个红卫兵小组扩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干部子弟支援清华附中的活动，当然都与他有关。故王铭一进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铭的进入也导致了我们和

高六三一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联系，自四月底开始，我们和郑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那时，我们一方面和他们在暗中对抗，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们是紧跟党中央的大方向的。

四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清楚地记得这篇社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奋，至今邝桃生洋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地朗读这篇社论的景象犹在眼前。紧接着发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他们的情绪带到一个高峰。此后到六月，他们仔细跟踪解放军报的每一篇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而且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使他们雀跃，欢呼，兴奋不已，犹如已经壁垒分明。我们这几位非团员，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对抗这个小集团的主要运作人。到那时为止，我们的思想并不复杂，对大的政治形势的背景毫无了解。只是凭着直觉，和一些不甘挨整的平民意识。我们并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内斗争。所以，即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林彪在《毛泽东语录》上的题字，和林彪的每一个指示作为大旗，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六月运动全面开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运动原来主要是中央的权力斗争。而在四月和五月，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这些话和《解放军报》这些文章的意思是对我们不利的。

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另一次兴奋高潮。报纸的这些文章真是令这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奔忙不迭。那时，我们班里并不订这两份报纸，由于学校偏僻，弄到报纸并非易事，但是他们总是及时地把报纸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传阅。

十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札记’的反动本质”；十一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这期间还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于彭真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而仍然把引导全国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讨论”的二月提纲发到全国，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此后，在多次谈话中，他指责《二月提纲》混淆界限、颠倒是非，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终于北京市委于五月十三日被彻底改组。十六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道：“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轶欧亲往北大，鼓励聂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这一切在卜大华等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

始终“和党中央”亦步亦趋的以王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为首的清华附中的这一小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风云中充分了解山雨欲来的形势，尤其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般人六月一日后才知道）后，他们亢奋到了极点，终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小组”。在讨论叫什么名字时，张承志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大家一致赞成。至今，张承志还以红卫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

他们能抢到在全国大革命的运动开始前三天行动，在那个信息封闭的社会，他们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们一下子感到风向不对。然而，我们虽然敏感地决定必须向校党委提意见才是当前的方向，并且在六月一日连夜贴出很多向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经把我们推到了无法翻身的“保皇派”的境地。事实上，由于我们是作为干部子弟的对立面出现的，象在娄熊打架中那样，无论我们是什么观点，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败。因为那时中心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况且，那时，这些平民子弟既没有那种关心大政治的意识，也没有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魄（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有）。

六月二日红卫兵小组贴出了第一张向修正主义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当然攻击的重点是所谓掌握了权力、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界贯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和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字报中充分显示出他们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紧跟由毛泽东确立的，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的“政治形势”，维护最高权势。大字报中再次显示出干部子弟先天的对平民和对一般基层干部的蔑视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在这篇大字报中明确地写道：“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与此同时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强（干部子弟出身，团支部书记）和高六三三班的一些人也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两边大字报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而我的朋友和我没有在任何一边签名。从这一天开始，清华附中气氛大乱。然而，由于无人能动校领导，校领导也无力控制局势，所以，学校呈现为混乱的对峙。

六月八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由城里来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两年四清中就已经闹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据说有前文说的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华附中的学生和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校领导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这哪里可能有效。“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躁动人群中的一句调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们心底的声音。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妄的干部子弟心中什么时候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呢！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有人开始对校长无礼，恐怕这是清华附中最早武斗，蹂躏干部老师的开始。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学生。高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自动站出的一位同学。她在愤怒之下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并且公然面对这一群从来不把一般人看在眼里的喧嚣的干部子弟朗读。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斗、被整肃，并且遭到红卫兵们切齿的痛恨。而我们这几位从四月就和红卫兵小组分庭抗礼的人，要比宣夏芳“狡猾”，我们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势，尽管无论怎么都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位置，但是，我们不会愚蠢地冲到第一线去。

当晚，无法安定的清华附中从团中央开来了以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的工作组，宣布接管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不是从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从团中央派来工作组，是不是也和某些干部子弟通天有关，我至今不知。我听说是某些干部子弟到团中央汇报，请来的工作组。那时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我们学校高一年的学生。

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正如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所承认的，那时，组长刘晋要每天向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这一事实更加说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根本上是被豢养的。

五、六六年红八月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六月九日起红卫兵成了清华附中的掌权者，思想革命化、取缔黑市之风也就占领了清华附中的每一个角落。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这一段在学校中主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对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老师及班干部的揭发批判。全校性的活动就是对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的批判大会。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和声讨在圆明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当然“坐飞机”、揪头发之类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而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干部老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对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也展开了整肃。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级，最开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例如我们班，挨整最厉害的是杨荣杏、田小庄（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和王东岩。高六三二班则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红卫兵小组的张明主持对王家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张明主持下的多次批斗会。教室门开着，很多外班级的人也在旁听，里外挤得水泄不通。批斗会上不仅拳脚相加，而且张明居然卑鄙地说，王家强的父亲出外革命，为什么会生下王家强？他是他母亲和他爷爷生的。这对我们那些孩童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我现在能想象这对那时十几岁的王家强的心理会摧残到什么程度。说身心备受摧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张明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跨班批斗出身好的王家强，据说他们以前有积怨。批斗会上对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肃最积极的倒是红卫兵小组中被我们称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

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给老师和干部剃阴阳头。自八十年代来曾经主演过多部电影的女演员霍秀儿，那时是初一年的学生，也被剃头批斗和殴打。各班都开始了批斗老师和同学。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贞都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并且被剃了头。他们和校长等领导一样每天进校门，批斗会前都要自称，“我是×狗，我老老实实认罪。”而无论是什么批斗会，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么。

大约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的同时，各个中学和大学也都进驻了工作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从六月初，红卫兵开始掌权之时，阶级路线进入了全面的极左时期，血统论开始越来越表面化。没有血统论根本就不会有红卫兵！！这句话一针见血。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没有那时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没有阶级路线和掌权“指点江山”的抱负，哪里会有红卫兵的冲动。

从六月九日起，郑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郑狗光召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就是从六月九日后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见面互称和自称，“郑狗”、“戴狗（建中）”，“赵狗（伯彦）”、“刘狗（喜鸿）”，就是那个时候在各班的批斗会上，和大字报中留下来的充满血泪的戏称。

从六月九日开始，直到八月底开始串联，学校活动散漫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作的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和互相揭发。

我所在的预六五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几乎都成了校一级的“领导”，班里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并不很好的但是跟他们跑的人的手里，当然象李德庆那样虽然坚决地和他们一起造了反，但是由于不会阿谀，六月九日后就身不由己地逐渐出了局。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发游泳证时，那位自己出身就有问题的李姓女同学站在教室中的叫嚣，“他妈的，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你们听着，你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留在教室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我们进行了审查，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游泳证。”没有领到游泳证的其实还包括个别出身好的前班干部。

郑光召在工作组进校后一周左右画了一副毛泽东画像歌颂毛泽东象红太阳，但是，这马上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资产阶级狗崽子怀着阶级仇恨，丑化伟大领袖，居然把伟大领袖的脸画得通红，并且有很多处不像。”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人大会堂，第一次正式接见了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首领立即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在第二天就连续贴出一论、二论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并通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转交给刘少奇和毛泽东。（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当然，可能两个渠道都走了）三论“造反精神”是共产党思想和文风极其典型的产物，集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种无知、狂妄，对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视。就这种意义说，骆小海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的成员不愧为共产党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养出一代，不愧为极权的共产党人的后代。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多元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必然蜕化的结果。在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语句（全文见本刊增刊 z k 9 6 0 3 a）：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你们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说我们‘粗暴’，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共产党大批判语言到六六年中期的这一跳跃，扯掉了任何伪装词句，任何温文尔雅的面纱，就连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也感到有些过分。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有过的和工作组的所谓“矛盾”。然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象以往一样成竹在胸。

果然，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又特邀了部份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领导把清华附中红卫兵首领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还在天桥剧场开的一次红卫兵大会上突然秘密召见过卜大华等少数几位红卫兵头目。这一下子把这一毒焰燃向了全国。破四旧、抄家、血统论犹如天方夜谭魔瓶中放出来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全国沸腾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当然要站在第一线，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整个社会和学校里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

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一时期已经走向舞台中央。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清华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后，作为群众运动中的所谓“过火现象”出现的，在工作组撤离后到八月十八日之间形成高潮，是全国的先导。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是继三论之后，红卫兵小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报。不是他们“经不住社会浪潮冲击，而写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章”，而是多年来在他们血液中奔腾的思想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脱颖而出了。出自熊刚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飞向全国。这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可数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几次重大影响之一。

在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后在清华大学也进行过的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完全是站在拥护的立场上的。由于对联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阻力，并且有大字报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人，大学的干部子弟希望中学的干部子弟能给予支持，曾经所谓“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感到事态严重，八月初，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褪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后联动的先声。

打人事件几乎是与红卫兵的得势孪生而来的。六月八日大批城里中学的干部子弟齐集在清华附中门外之时，对出来劝阻的副校长韩家鳌就已经有暗中拳脚。从九日工作组进校红卫兵掌权开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脚，走向桌面。在清华园各处，只要有“黑帮”（即有问题的干部或老师）人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拳脚。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在群众围攻现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艾知生（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时，从身后给了他一脚。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后，斗争行为一下子升级，十八日北大师生设“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戴高帽批斗。

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三论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且不说，万邦儒和韩家鳌等校领导每天要在纠察队（队长就是张承志）的皮鞭下（一点也不夸张），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而且动辄就会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学生来说，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已经有近百人，其中在运动前就对立得很厉害的某些班级，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掉下了地狱。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郑光召、赵伯彦、梁强、刘喜鸿、戴建中、徐经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领导红人王家强和张蕴环（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动学生，张蕴环甚至被剃了阴阳头。他们除了必须每天写检查参加劳改外，都不断地遭受毒打。其中郑光召被打得肾出血，赵伯彦只因为在挨打过程中不叫唤，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几个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的检查在将近五十米的楼道中对面贴满，地方不够又转到楼上，“浪费”了几百张纸，还是不能过关。高三的女生郭兰蕙，高一的女生杨爱伦出身一般，被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堪侮辱，前者服敌敌畏自杀，送到医院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身死，后者神经恍惚，在撞火车时虽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几只手指头，成为残废。

在此前后，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因为不堪批斗而从锅炉房的大烟筒上跳下自杀。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六四年高中毕业留校的高惠英老师（女，校共青团团委书记）被皮带的铜头打瞎了一只眼睛。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斗会上，学生们排队，每人都要用皮带抽打副校长韩家鳌几下，以表示自己革命，无人敢于拒绝下手。至于被铜头皮带打得浑身是血的则不仅有校长万邦儒等校级领

导，还有一般教师和同学等至少几十人以上。

我前面曾经提到骆小海在工作组在时的某次大会上，得意洋洋地铿锵地朗读他的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檄文，红卫兵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们旧日的同学至今还经常在一起戏谑，“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砸个稀巴烂。”这些杀气腾腾、充满血腥气的语句，确实只有清华附中这些有才气的红卫兵小组的人才能体会并将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蕴中升华出来。

从八月上旬开始，清华附中这些有“独立思想”的红卫兵“开创”的阶级路线血统论问题、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象八九年六·四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疯狂的毁灭时期。叫它红八月，是准确的，它充满了血腥。这个红八月当然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以及其它干部子弟所主导的，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导演的发展结果。起源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区别只是在于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于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则是一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

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的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后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的红卫兵！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份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附中宋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但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重的接见。八一八之后，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的风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于这场火烧到了这群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造成了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来，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后，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话说，平民们“直到十月以后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未完待续）

□ 原载《北京之春》第四十一期（1996年10月），本刊有删节

~~~~~  
【五洲震荡】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 1966—1979

高达乐 (Claude Cadart)

## 一 文革与法式毛主义

从政治学的观点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场庞大的政治反革命，其性质既含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又带着浓厚的军事官僚主义气息。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在66—68年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是如此“体验”这场“革命”的。相反，他们把它当作是革命群众和被压迫民族从已堕落的共产主义大阵营的官僚领导，以及从世界资本主义巨头们箝制下解放出来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解放运动。

当时我是一个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法国极左派知识分子，但我警觉到这场“大革命”所谓的独特“创新”，要比过去十七年间红色极权政制下任何最坏的情况更加倒退、更加黑暗。

可悲的是，三十年前的这场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吸引了当时大批法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派或极左派的知识分子：作家、哲学家、艺人、教师、著名报章杂志发行人……。这个热潮也扩展到深受他们影响的大学生和青少年群众。换句话说，它席卷了整个法国知识界，并逐渐形成一股真正法国式的毛派潮流。值得注意的是：从66年尾到72年初，正当这股毛主义潮流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掀起狂飙时，中国大陆的群众已经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去热情；而法国式的毛主义直到78年还在犹豫，并在传媒界、电视“文化”节目中为准知识分子大学生指引方向。一直到中国官方在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情况才有改变。

什么是毛主义？基本说来，它是斯大林主义红色极权制度的嫡系，并逐渐演变成：①在一个庞大落后国家夺取政权，执掌政权，必要时再夺取政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派系；②一个极权制度，带有虚无缥缈又有极大伸缩性的革命乌托邦；③神权式的、对毛泽东个人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崇拜。对上述三个毛主义的根因，法国式的毛主义者或亲毛派只接受第二个因素，即“乌托邦”，也就是毛主义的“外套”或“装配”，它的幻景。至于第三点，即对毛的崇拜，他们只是勉强接受。然而他们为此辩护，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暂时性落后的表现，并且说毛自己都不赞成它的“过份”。他们基本上崇毛，颂扬毛主义的“深奥”，吹捧“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和“独一无二的创新”。而对于毛主义引发出来的那种“为了夺回政权，不惜摧毁千万肉体、灵魂和文化”的疯狂行为，法国式毛主义者就绝不问津，甚至否认一切，根本不愿听到这些“无稽之谈！”他们会把你骂成说谎者，加以攻击污蔑。

法国式的毛主义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居然能从66年延伸到79年，实在是那个时代法国知识界的耻辱。我自己虽曾竭力去揭发它的丑恶，但总还是感到某种自责，这是因为我未及时认清我自己和某些“同道人”之间的基本分歧。直到今天，法国知识界的这种耻辱依然存在。除了几位比较有勇气的人士，像吉斯玛 (Alain Geismar) 或者布罗埃 (Claudie et Jacques Broyelle) 夫妇等等之外，它从来没有公开地对自己的“罪过”表示惭愧和反省。我无意对法国式的毛主义作道德判断，更不愿对之加以宗教式（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我只是尝试探讨这个病情的各种症状、追溯病情迸发的线路和缘由。

## 二 参与“五月运动”的派别及其阶段

法国式的毛主义当然不能和法国68年的“五月运动”混为一谈。我自己曾以个人的、反毛主义的理念参与这个运动，我从不后悔这样的参与。但不能否认，法国68年“五月运动”与法国式的毛主义曾经有过相当密切的联系。法国的“五月运动”是在66年夏到68年春之间由三个政治和思想派系的暗潮逐渐汇成的（它们各自又可分成许多小支流），其中有毛主义派系，托洛茨基主义派系，和必须提到的无政府主义派系。在仅仅一个月的高潮时期，大约从68年5月10日到6月10日，真正掀起这个运动且占主导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派和托洛斯基主义派。毛派、托派和无政府派有六种共同要排斥的事物：①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②令人麻木不仁，失去人的尊严和对人类前景憧憬的“消费”社会；③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④斯大林主义和旧的极权官僚主义秩序，代表温和的斯大林主义和软性的新官僚秩序的赫鲁晓夫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⑤由苏联设想的“和平共存”；牺牲以越南为首的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五大洲的“革命先锋队伍”利益的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共存”；⑥与法国任何“合法存在”党派的亲善，特别是被认为仍然服从苏联的、完全“堕落”的法国共产党。

对这些在法国68年“五月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派系来说，“共产主义世界”虽受斯大林主义影响，但还是“大体上可肯定的”，无论如何总比资本—帝国主义稍胜一筹。这些年青人崇拜的英雄是胡志明、武元甲将军，因他们是越南抵抗美帝的象征；是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因他们是革命的拉丁美洲的象征；是毛泽东和“红卫兵”，因为他们是为国际共产运动的复苏斗争的象征。然而，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几种不同的象征、形象之间的矛盾和不协调。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有期待；他们无所适从，睁着眼睛做梦。黑与红色都是他们的旗帜。当时最能表达他们意识的口号，是“情势主义者”（situationnistes）在巴黎大学旧址索邦校园走廊里一张著名的壁画（是十九世纪 Puvis de Chavannes

的杰作）上抄写的字句：“当人们用最后一个资产阶级和最后一个官僚主义者的肠子把他们上吊时，就是全世界最欢乐的时候！”

法国“五月运动”是由学生群众、半知识分子和职业知识分子聚合而成的，居然马上得到出乎预期的巨大胜利。不过它的胜利是短暂的，这是由于运动本身的自发性，成为与它平行的工人大罢工运动的导火线，即使这个大罢工运动由蓬皮杜政府机巧地迅速以全面增加工资的方式把它堵住了。但不能否认，这个运动在法国各个领域发生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无政府主义派系在这个运动中占了极重要位置，而托洛斯基主义派及毛主义派则紧随其后，直到运动骤然中止。

运动最终失败了，马上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哪个政治派系有力量、有本事将“运动”据为己有？由于无政府主义派在运动末期已无法掌控大局，那么在托派和毛派之间，应该由谁来收拾残局？很快有了回答：是毛派。局势的变化在68年6月初就露出端倪：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小城弗兰，雷诺汽车厂门前发生一个亲毛派中学生多丹（Gilles Tautin）被警察杀害的事件，他很快就变成“五月运动”的烈士和象征。68年8月，捷克的和平革命被苏联的坦克大军镇压之后，这个情势愈加明显。

谈到法国式毛主义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长达两年，从66年夏起始直到68年春才告一段落，主要是由美帝侵犯越南、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引起的。这个初生阶段绝不同于它的“史前”时期（1958—66），但仍深受影响。基本来说，这一阶段的法国式毛主义还是属于非组织性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的范畴，而有组织毛派分子的活动是属于次要和补充性的。比如当时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及其机关报《红色人道报》根本就

没有影响，连北京也不怎么重视它。

第二阶段是68年5月，只有一个月。当时亲毛派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是审慎地关注这个“运动”，而“五月运动”则为新起的毛主义活动分子提供一个发动示威的机会。他们参与“运动”的方式很肤浅，多是仿效中国“红卫兵”的游戏：在法国大城市的高级住宅区张贴大言不惭、漫画形式的“大字报”，或是肆意怒斥鞭鞑法国的旧习俗、传统道德行为和古老文化。

第三阶段始于“五月运动”的后期，即从68年6月亲毛派中学生多丹被枪杀到72年2、3月间；也就是从另一位亲毛派少年欧弗耐（Pierre Overney）在巴黎彼扬果区雷诺汽车总厂大门口向工人散发传单时被枪杀，到林彪死亡不久的一段期间。这四年是法国式毛主义兴盛时期，有组织的毛主义战士同无组织的毛派理论家、知识分子并肩同行。可是，与第一阶段的情况相反，这次是由毛主义战士们定出宣传主调和行为规范，而亲毛派知识分子只是跟在后面，对运动备加赞赏称颂。

第四阶段是停滞、走下坡的衰落时期，总共七年（1972—79）。这个时期的有组织毛主义者已经不能起主导作用：他们大多迷失方向，有的甚至绝望了。但他们还保持相当的明智和勇气，拒绝投向恐怖主义暴力政治的路，也即没有步意大利“红色旅”或秘鲁“光明之路”派的后尘。当时法国式的毛主义主要是由无组织的知识分子们代表，尤其是已成名的知识分子，或是法国左派和极左派内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的掌握者。正因为如此，第四阶段才拖了七年之久。在往后十年间，他们一方面羞于公开承认自己受骗，另一方面又因欺瞒青少年群众读者而遭世人的耻笑，遂使他们失去影响。但为了自己的存在，他们不得不继续欺瞒下去。

### 三 法国式毛主义的不同类型

1966—79年的法国式毛主义的内容相当复杂丰富多样化，毛主义的信徒、牺牲者、受益者也形形色色。

在有组织的毛派成员里虽然可以找到几个成名的知识分子，但大多数是学生或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也有极少数工人。在毛派旗帜下，虽然有少数毛派学生或知识分子到工厂当工人，但青年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仍有不少困难。有些比较出色的法国式毛主义者，大多是不久走入地下的“无产阶级左派”的成员。记得70年6月底萨特（Jean Paul Sartre）就是为了在大街上散布这个组织的机关报《为了人民》而被巡警抓去坐了几天牢。68年“五月运动”曾有两位头面人物：孔本第（Daniel Cohn-Bendit）和吉斯玛。前者是德—法籍的无政府派学生领袖，被法国政府在五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放逐到德国；后者是法国教师工会领袖，运动失败后马上加入“无产阶级左派”，不久也跟其他同道者一样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组织也有一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派”成员，他们的“大主教”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一位反人道主义马克思派哲学家，是知识群里有名的怪人。

“无产阶级左派”是法国几个毛主义派系中最有基础、最有影响的政治团体，此外还有一个较松散、自发但思想倒相当“正统”的组织——“革命万岁！”，其倡导人加斯特罗（Raul Castro）是位建筑师。除了这两个较具规模的分支，还有一些星散的“无政府—毛主义者”小团体，他们戏称自己是“自发性的毛”。这些团体不断分合，对现有秩序进行了荒诞无稽的象征性的对抗。当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在60年代初破裂时，那些建立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老一代斯大林派“中国友人”仍进行活动，可是他们的影响很有限。

是否所有法国式毛主义派都是真诚的信仰者？我可肯定地说，大多数毛派“战士”和少数亲毛派知识分子虽不明智、走错了路，但却是真诚的。我当时很理解他们的心态，因我自己也曾经是法国最早期的亲毛分子之一。对极左派知识分子来说，在当时（1958—62年）做一个亲毛分子会被认为是绝对荒诞可耻笑的事，肯定是自找麻烦。以我当时的思想为例，那时发生在中国的三面红旗运动令我兴奋，以为重视“主观因素”就可以加速人类走向“自由王国”，一日千里地迈进“共产主义”。更使我高兴的是中国重整世界革命的旗鼓，我盼望这些事变能唤起被西方资本主义压抑的无产阶级“意识”，尤其是法国无产阶级。所以，当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1966到79年间又燃起同样的幻想时，又怎么能不叹息。

至于大部分无组织的、个别的亲毛知识分子，是大大不可原谅的。他们当时是为了私利或是出于一种胆怯的表现才“亲中国”，因为毛主义已成了一种时尚，所有左派、极左派知识圈全盘地、不可抑制地向它倾斜。记得在66年秋一个声讨美国进犯越南的大会上，一位著名法国知识分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招呼中国驻法大使馆的代表时，竟然引用孟德斯鸠的名言“怎么能做波斯人！”但他倒过来说：“今天怎么能不做中国人！”这样令人恶心地捧中国官方代表，实在使我震惊。他们这些人可粗分为几类：“沙龙”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义；学院教授“专家”们的毛主义；思想大师的毛主义；新闻记者和信息操纵者的毛主义。

#### ◇“沙龙”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义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①由崇尚美学，倡导“性”绝对解放的索勒尔斯（Philippe Sollers）主编的《如此即彼》杂志，经年刊载中国的“精华”、优异的文字、“红卫兵”和连续的革命……唱起痴愚狂欢似的高歌。②法国“新潮”电影界最狂妄、被捧上天的戈达（Jean-Luc Godard）的电影《中国女人》，67年在巴黎上映就马上赢得文化界大声喝采（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后，96年8月间它又在巴黎时尚地区圣杰曼以温故怀旧的姿态再次登上银幕，可能是献给“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纪念！）。影片中的女主角并不是吸引法国男子的漂亮中国姑娘，而是个白皮肤、令人生畏的“激情女怪”，是一小串“掉了脑袋”的马列派分子的头头，她为了“革命”这个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极正统地把一个法国“阶级敌人”（原来是一个同伴）处以死刑。

#### ◇学院教授“专家”们的毛主义

大学甚至中学里某些成为“权威”的汉学家，他们衷心要“保持和中国的联系”，哪敢对中国发生的“文革”说实话。他们“美化”文革的理由是要使人们理解它，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谢诺（Jean Chesneaux）。他本来是位通达明智的共产党人，是五十年代末在法国建立一个自主系统的现代与当代中国研究最有贡献的学者。但为了“走在风向的前头”，一劳永逸地保持在学府和政治圈子里的优越地位，他不惜从最坚决的亲赫鲁晓夫派跳到毫无保留的毛主义派。其次，有大批非汉学家知识分子从亲毛派的汉学家那里得到大量“资料”，就自以为对中国的事无所不晓，他们一本正经地跟你说：“中国（毛式）的革命要比俄国革命无比地‘节省’暴力的消耗。”

#### ◇思想大师的毛主义

主要是指萨特和他的同道们的犬儒式毛主义。他们很清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负面现象”，却在法国全力支持最激进的毛派份子，帮助他们选出“文革”的“正面的虚象”、伪造“现象”。我无意挑剔萨特，但根据记忆中的具体事件，我对他是颇有微词的。67年夏，我访问了当时住在法国的彭述之（中共早期领导



人，后成为托派——编注），这份难得的谈话记录对分析研究“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实在意义及其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有特别的启示。我将这篇文章投给萨特主编的杂志《现代》，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看了很欣赏，杂志编辑都已准备在67年尾或68年初发表。可是在67年末，萨特通过郎斯曼（Claude Lanzman）告诉我：他最后还是决定不发这篇文稿，原因是这篇访问篇幅太长，加上里面的中文字用拼音系统，法国读者看不懂。我建议缩短文章，将拼音改为西方习用的Wade-Giles或EFO系统。代表萨特的郎斯曼根本就不听我的，坚决拒绝继续同我打交道。我即刻了解到，萨特根本不愿意他的读者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情，他认为在法国对“文革”说实话的政治时机还不成熟。他自然已警觉到一阵狂风即将卷来：“文革”已发生了18个月，法国毛主义越来越受青年群众的欢迎，是个深远的趋向。如果他对抗这个趋向，走向反潮流，就很可能牺牲他在法国的声望和影响，不再拥有主要思想大师的宝座。更甚者：对于未来局势演变，不再起重要作用，从长远来看，会完全失去左右时局的可能性。他这时的行为和动机挑起一个使我痉挛的回忆：五十年代萨特为了同样的缘故，最后终给予斯大林主义“祝福”，在他的影响下，太幼稚和立场还没确定的我也和斯大林主义者队伍同流合污。他在《Situations》一书中曾提到：宁愿在适当时刻犯错，也不要在不当的（不利的）时刻有理。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位机会主义者。68年“五月运动”爆发后不久，萨特就变成法国最起作用、最有效率的亲毛派之一。他对当时走亲毛极左派路线的《解放报》的诞生有决定性的贡献，后来由另一位犬儒主义的亲毛派居利（Serge July）主持改成日报。第三位犬儒主义的亲毛派人物就是“革命万岁！”的主要领袖加斯特罗，萨特无疑是他的启导人。这位先生曾在巴黎68年秋举行的一个极左派的大集会上（我当时是听众之一）公然声称（大意如下）：“历史！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哼！我全不在乎！它毫无用处！谁去管它是现在中国发生或没有发生，还是过去发生过或没发生过的‘真实’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推进群众向前走，而是神话传奇把他们推向前进，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

#### ◇新闻界、垄断信息传播的毛主义

整个左派新闻界犯下的最大罪过，就是有系统地“错误报导”中国“恐怖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情，目的是令读者遗忘它的存在。左派新闻媒体的这种行径使整个法国舆论界蒙羞。我们只要翻阅1966—80年的《世界报》、《解放报》及《新观察家》周刊，就可看到当时“独立信息传媒机构”的主要编辑负责人是如何严重地违反自己的职责和道德规范的！当时那些大显身手、风头十足的记者们（像《世界报》的布克（Alain Bouc）、杰可勃（Alain Jacob），《新观察家》的卡洛尔（K.S. Karol），或《解放报》的如埃尔（Patrick Ruel）……）如今应该感到多么羞耻！当时他们都是法国最具权威的“中国信息”的传播者！当时法国（属政府的）国家电视、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又多么可耻！

#### 四 初步反思、追根溯源

然而，并不是所有法国左派和极左派圈圈的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在1966—79年都受毛主义的感染。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教授对毛主义提出反抗抵制，但却遇到层层障碍：他们的“同事”、出版商、新闻界……公开或暗地里设法阻止他们发言，只要他们想在任何辩论会中启口就会惹来麻烦。毛主义者和亲毛派时常用严苛拷问的口气问他们：“你和中国有甚么关系？！”如果回答是：“太可悲了！中国真正的友人，目前对全世界官僚和金钱共同建立的秩序真正对抗的人们，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非常反感”，这些“反毛主义者”就会被扣上“莫斯科的特务”或“华盛顿的帮凶”这类帽子。虽然这些极少数清醒的法国人无法拯救法国知识界的清白和名誉，但他们至少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当时的“情

势主义者”韦也纳（Ren Vinet）、张襄保（Jean Paul Chang）、得龙（Francis Deron），是很活跃的反毛派人物，他们有鼓动才能，很懂“公共关系”，亦很尖刻。1971年西蒙·来斯（Simon Leys）出版的富有启示的描述中国现状的书《毛主席的新衣》之所以畅销，他们起了决定性作用。除了他们以外，还应提到思想家勒佛尔（Claude Lefort）和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汉学家皮洋可（Lucien Bianco）、程映湘女士和我自己等……。

1966—79年法国式毛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实缘于四种根源（全是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演变有关系）以及有利于这个现象发展的四种土壤（在二次大战前，甚至更早已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法国）。

先说四种土壤：有两类是纯法国的，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传统和法国土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其他两类是中法混合性的：旧汉学家或更早期仰慕中华文明的法国人士对中国理想美化的传统，以及法国人由国家自我中心观念产生的对中国活生生现实的无知。

四种根源：第一种根源是法国民族复兴后的新亲华潮，它是从1944年开始以地缘政治为基础出现的，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发扬壮大；第二种根源是法国式的斯大林主义，它从1944年就渐渐冒起，五十年代初期更是众望所归，一直到56年后才渐次衰退；第三种根源是法国式的第三世界主义，它从四十年代末已发生，然后与法国式斯大林主义平行发展，并从55—56年起代替了法式斯大林主义；第四种根源是49—66年，尤其58—66年间在法国左派和极左派中间出现的亲中国新潮流，其中包括反斯大林主义，更明显的是反赫鲁晓夫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法式毛主义的“史前”时期。

自从法国在1944—45年间奇迹似的逃离以纳粹新模式出现的德意志帝国主义魔爪后，法国左派和极左派知识分子犯下了两个沉重的罪过：先是向斯大林主义倾倒，然后又拜倒于毛主义威权下。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们大多数曾是南半球三大洲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最坚决、最勇敢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曾奋勇地向自己国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宣战。

随着89年以来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毁，人类各种基本的问题又以崭新姿态出现，需要世界各国知识分子尽力考察、思索、想象和发现新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间似乎有某种觉醒，即他们拒斥那种一统化、实用主义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抵抗正在西方和东方上空朦胧乍现的那种新极权主义和新全球官僚政治混合的怪物。

程映湘 译

□ 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第三十七期（1996年10月号）  
<http://www.cuhk.edu.hk/ics/21c>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赵桦（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关蔚禾（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萧 同（美 国） <cnd-cord@cnd.org>  
《CND》总编：    温 冰（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  
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149.159.2.6]：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  ：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